

美國政治極化現象： 三個不同維度的觀察

• 李海默

若說當前美國政治研究領域的一個核心重點是甚麼，首推自然是洶湧如潮的政治極化(Polarization)現象①。1960年的民調告訴我們，大約只有4%的民主黨人和4%的共和黨人會在意其子女與另一黨人士結婚，但到了2019年，45%的民主黨人和35%的共和黨人都表示很介意和不高興看到其子女與另一黨人士婚嫁②。依據美國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數據對比，1994年共和黨與民主黨選民交互重疊的部分比較大，民主黨中不論何事皆持自由派立場的、共和黨中不論何事皆持保守派立場的人都不多，兩黨各自的中間選民(median voter)所處的位置和立場也比較接近。但到了2017年，數據則顯示兩黨選民交互重疊部分明顯縮小，民主黨中不論何事皆持自由派立場的、共和黨中不論何事皆持保守派立場的人皆顯著增多，兩黨各自的中間選民彼此間隔也明顯變遠③。從2019年特朗普(Donald J. Trump)的彈劾案也完全可以看出美國政治的高度極化，發起彈劾的眾議院最後投票數是232票支持、196票反對，共和黨人全部反對，而民主黨人中則僅有

兩人未投票支持彈劾④。2018年美國中期選舉時的出口民調顯示，76%的投票者認為美國正顯得愈來愈分裂和彼此對立⑤。而2019年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項民調則顯示，約87%的美國人認為政治極化正在威脅美國政治生活，超過60%的美國人認為民主、共和兩黨都在變得過度「極端化」⑥。2020年初斯坦福大學的一項研究也顯示，在政治極化現象日益深廣這一方面，美國比世界其他各國都更顯著⑦。

在這個政治極化日趨劇烈的時代裏，對不同黨派的支持，是嚴重分化且高度對立的，許多美國人對於與自己不同黨派的政治主張不僅無法認同，而且異常憎惡和痛恨⑧。這種極化現象表現在日常政治場域裏，主要是民主黨與共和黨之間的激烈黨爭；若說表現在意識形態領域，則主要是進步主義和保守主義之間曠日持久的拉鋸戰。政治極化的核心危險是，它雖能提供海量的情緒性煽動，為政黨候選人提供一定的選票來源，卻甚少能給出政治—社會問題的真正解方⑨。而這明顯不是建國一代在原初設計美國政治體制時所希望見到的，

因為那批人心心念念的是典型的責任政治^⑩，而非這種旨在調動和運用情緒性票源、卻無助於真正提供解方的政治行為範式。

艾迪(Gregory Eady)等人在2018年針對全美政治科學學者的一項問卷調查顯示，特朗普是受訪者心目中美國政治史上最具分化性的總統——遠超位列第二名的林肯(Abraham Lincoln)^⑪。哈克爾(Jacob S. Hacker)等人的研究堅稱，政治極化主要是由於政治光譜右端的人士急劇極化，不復溫和審慎所造成^⑫；麥卡蒂(Nolan McCarty)等學者也認為，在政治極化日益增長的潮流中，主要的動力源是共和黨愈趨保守化的傾向，自1970年代開始，每一屆共和黨的新晉議員都比那些仍在職的老輩，有着更為保守的法案投票記錄，疊加累積，是以至今^⑬。佩奇(Benjamin I. Page)等人的近著則認為，當前的政治極化遠因是自1964至1965年間南方民主黨人的大量失勢開始^⑭。

根據阿布拉莫威茨(Alan I. Abramowitz)的研究發現，從美國選民相關的統計數據看，造成選民極化的最重要因素包括當今美國社會的種族多元化、傳統宗教的衰落和世俗化的興起、帶有偏見性質的大眾傳播媒體日益繁盛等；在如今政黨政治高度極化的時代裏，大多數國會議員不再有與另一政黨合作的動力，因為這樣做將很有可能損害到他們自身的政治生涯前景^⑮。麥卡蒂等人的研究着重強調，目前美國政治中逐漸增長的政治極化是與社會、經濟領域中的變遷密切相關的，尤其是收入不平等的快速增長^⑯。

海瑟林頓(Marc Hetherington)等人最近的研究指出，美國政治史上政黨政治幾乎從頭到尾都是存在的，但

是美國政治史並非一路以來都是政治極化的，如果政黨要呈現出政治極化的風格，那麼「普遍民眾需要首先對他們各自特定的身份認同，感受非常強烈和熾熱才行」^⑰。塔利斯(Robert B. Talisse)的研究也認為，極化現象的發生全與人們過於在意感受(feelings)相關，導致他們將政治上的選擇視為群體性的身份標籤，而將政黨視為一場「贏者通吃」的死亡競賽中彼此激烈作戰的群組^⑱。西馬斯(Elizabeth N. Simas)等人在2020年的最新研究則指出，「同感共鳴」(empathy)這種心理要素的經驗在實際政治生活中，往往會特別傾向於個體所處的具有排他性的小集團、小圈子，並因此進一步惡化政治極化現象，實際上，意向化的同感共鳴(dispositional empathy)往往加劇了黨派極化的現象，這與尋常的看法很不同^⑲。

已故美國著名政治學者威爾遜(James Q. Wilson)曾強調，對二十一世紀的美國而言，政治上的高度分化對立，可能會是一個重大甚至是致命的問題^⑳。政治極化加上民粹主義風潮，從一個方面看，使得特朗普非常容易用修辭術操縱民意和選情，從另一個方面看，美國內部(兩黨激烈競爭，近似於零和遊戲)和外部(美國及其盟友關係)問題皆明顯削弱美國的實力和影響力，在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全球蔓延的大背景下更是如此^㉑。

一般認為，積極的政治活動、選舉制度與政策、媒體傳播效應，以及群組性的心理偏見，都可能加劇促成極化現象，但是極化的內在機制的確也相當複雜，未可一言而論定。關於極化現象，一個極端重要的、也是首要應被解決的問題就是：從數據上看，究竟是美國人普遍極化，還是美

國政客普遍極化，抑或是參與政治運轉的黨派積極份子日益極化？究竟是美國政治思想日趨極化，還是僅僅只是行為模式層面的激進化？在此，筆者希望簡要介紹和評價有關美國政治極化現象的三部新近出版的學術研究作品，或許能讓吾人對政治極化有更深入之理解。第一部著作關涉到對美國普遍大眾政治立場的理解和判斷，第二部涉及美國政黨政治運作和極化現象之關聯性，第三部則是從美國政治思想傳統角度考慮當前盛行的「身份政治」議題。最後，筆者略論特朗普時代終結、拜登 (Joe Biden) 上台後一系列重大事件與政治極化現象的關係。

一 究竟是群眾極化， 抑或精英極化？

筆者介紹的第一部作品是斯坦福大學政治學教授、美國政治研究領域大家弗里納 (Morris P. Fiorina) 在2017年出版的《不穩定的多數派：極化、黨派分類與政治僵局》(*Unstable Majorities: Polarization, Party Sorting, and Political Stalemate*) 一書^②。在弗里納看來，許多研究者所聲稱的在國會與各州立法層級大量出現的極化現象，主要是由日趨極化的美國一般廣泛公眾的對立情緒所驅動，實際上是有很大誤導性的。弗里納堅信，40% 左右的美國選民如他們自己所述的那樣，是沒有任何黨派歸屬的^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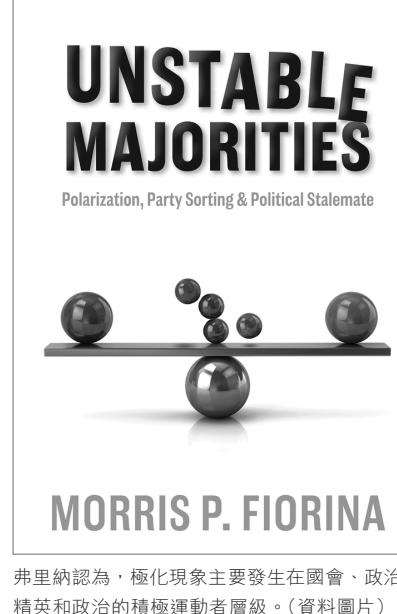
弗里納指出，如果美國政治真的已經完全極化，那麼理論上支持兩黨中任何一黨的選民人數就應該大幅增加，然而這情況並未發生。美國普遍民眾不僅在意識形態指標（自由或保守）方面說不上極化，對於黨派選

擇（共和黨或民主黨）其實離極化更為遙遠。比如一些曾經支持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奧巴馬 (Barack Obama) 的選民在2016年大選中轉而投票給特朗普，主要理由也並非因為特朗普是共和黨總統候選人^④。

弗里納認為，現在的美國政治格局類似於十九世紀末的所謂「僵局時代」(Age of Stalemate)，在那個時代裏美國政治決策無力，政治僵局頻現，國會佔多數的黨派一直是反覆變動不居，當選總統很少能拿到超過 50% 支持的選票，而且，就如 2000 與 2016 年的總統大選一樣，通過候選人團投票確認當選的總統並未實際贏得多數選民票。美國目前進入了一個執政黨不太可能長期維繫多數地位的時代，多數黨可能會呈現動輒就兩年一換的局面^⑤。

弗里納指出，從 2012 年大選到 2016 年大選，美國選民的投票行為變化其實非常小。若在密歇根、賓夕法尼亞、威斯康辛等幾個中西部州份（又稱「鏽帶州」，Rust Belt states）發生了數萬選票的移轉，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希拉里 (Hillary Clinton) 即可反敗為勝。事實是，那些在 2012 年投票支持民主黨、2016 年改投共和黨的選民，對現狀展現出一種不滿的情緒。因此之故，自由與保守兩派精英份子之間白熱化的爭鬥，不管看起來多麼激烈炫目，其實完全無法反映出美國一般民眾真正在意的那些問題^⑥。

其實，這樣的論點也是弗里納長期所持的看法。他向來認為，學界常言的美國內部存在



弗里納認為，極化現象主要發生在國會、政治精英和政治的積極運動者層級。（資料圖片）

激烈的「文化戰爭」(culture war)，體現在政治上其實並非如此。極化現象主要發生在國會、政治精英和政治的積極運動者層級，這些人明顯比以前要更為極化。但是美國的廣大公眾則並未有多麼極化，而是仍居於政治光譜較靠近中間的位置^②。由這種視角觀之，則「大多數選民在歷史上一直是，並且如今仍是持較為溫和與適度的政策立場的」^③，被炒作得火熱的所謂「文化戰爭」基本並不適用於談美國政治的實景^④。而且在弗里納看來，大多數普通美國人其實並不是那麼在意政治^⑤。

弗里納充分地觀察到，目前民主、共和兩黨事事針鋒相對而產生的「黨派分類」(party sorting) 現象^⑥，使得兩黨的內部都更趨一元化和同質化，今日美國選民很難找到一個立場偏自由的共和黨候選人，也很難找到一個立場偏保守的民主黨候選人；與一般基層黨員相較，處於兩黨領導階層的政治精英彼此之間的激烈爭鬥更為顯著。民主黨日益成為自由派份子匯聚之地，共和黨日益成為保守派份子的大本營，但這完全不意味着一般美國公眾也隨之在政治上極化^⑦。當然，並非所有學者都同意弗里納的觀點。反對弗里納的人會傾向認為美國社會實際上發生了巨大變化，愈來愈多新的元素（如二十四小時不間斷的大眾傳媒和網絡等）被帶入選戰競爭，這些因素是導致更多、更顯著的極化現象出現的本質原因^⑧。

在回答美國網絡新聞媒體Vox記者的提問時，弗里納也明確承認，與往日相比，民主、共和兩黨黨員之間彼此的相似性的確是減少了^⑨。最近的研究也再次確認：由於過去數十年間，美國國會裏共和黨成員政治行為日益趨向保守化，原民主黨陣營

中立場較為保守的選民受此感召，開始逐漸投奔共和黨，而原共和黨陣營中立場較為偏向自由派的選民則對此現象甚為反感，他們日益偏向民主黨，顯示出民眾的黨派選擇^⑩。

如巴爾達沙里(Delia Baldassarri)等政治學者所指出的那樣，問題的一個關鍵之處在於如何準確地界定政治極化。如果按照弗里納的定義，「政治極化」是黨派對立的廣泛現象，也許美國一般公眾真的並未走向極化。然而，如果按照另外一種定義，所謂「政治極化」是指：即使公共意見只在很少數的議題上極化對立，但意識形態與黨派化分界線在這些議題中清晰存在；那麼美國毫無疑問存在着廣泛的極化現象^⑪。

不過，弗里納說美國公眾並不如政治精英那樣極化，這一點也是值得留意的。伍德(B. Dan Wood)等人的研究儘管不同於弗里納的觀點，認為美國選民普遍在經濟和文化等議題上甚為極化，但他們也承認，就目前的數據而言，很難直接斷言美國一般選民和華盛頓的政治精英有着同樣程度的極化^⑫。

二 政黨政治的維度

弗里納的研究提出美國主要政黨及其精英日趨極化的現象，那麼若從政黨政治層面而觀，政黨內部究竟出了甚麼問題呢？在此筆者想介紹第二部作品，耶魯大學教授羅森布魯斯(Frances M. Rosenbluth)與夏皮羅(Ian Shapiro)在2018年合著出版的《可靠的黨派：拯救民主》(Responsible Parties: Saving Democracy from Itself)^⑬。

本書對美國政治極化現象提出了一個很有意思的看法：當前美國黨爭

RESPONSIBLE PARTIES

SAVING DEMOCRACY FROM ITSELF

FRANCES MCCALL ROSENBLUTH
&
IAN SHAPIRO

羅森布魯斯和夏皮羅認為，當前美國黨爭情況酷烈的主要原因就在於兩黨都太羸弱和渙散。（資料圖片）

情況之所以如此酷烈，主要原因就在於兩黨都太羸弱和渙散。如果共和黨本身組織體系強化一些，那麼像特朗普這樣一個對共和黨基本意識形態並不十分尊崇的人就不會成為總統候選人，之前崛興的「茶黨」(Tea Party)不會得到容忍，也不會在2017年讓醜聞纏身的極右份子摩爾(Roy Moore)競選參議院席次。對民主黨來說也是如此，如果民主黨內部組織足夠強，就能嘗試在選戰時更多地避免李伯曼(Joe Lieberman)、尼爾森(Ben Nelson)等民主黨及其黨團的政客公然挑戰民主黨和勒索利益^⑨。其實早已有人提出類似的見解，只是並未曾將其和政治極化相關聯。派特森(Thomas Patterson)早已指出：直到二十世紀初，美國政黨仍對提名和選舉等事項有着絕對的控制力，而到了2009年，一方面，政黨仍在招募候選人、募集錢款、發展政策面的論述、勘察調研選票走向等，但另一方面，政黨對這些步驟流程的控制力已遠不如百年前，許多此類事務實際上是由候選人及其選戰團隊具體操盤運作的，政黨組織的弱化已然是不爭事實^⑩。

兩位作者認為，一個民主體制若要運轉起來，最重要的基礎就是主要政黨必須強化，能夠有力節制其屬下的普通成員。過於虛弱的政黨導致了政治極化不受限制，只有強政黨才能在較長時期一直以服務於較為廣大的民眾利益為己任。而美國今日政治的核心癥結之一，就是兩黨缺乏對於其內部普通成員和積極份子「不予理會」的勇氣：掌控政黨運作的積極份子，往往不具備形塑出一個自洽且穩健政綱的能力，他們慣於瞎開「空頭支票」，也無意為政黨的長遠前途多做考量^⑪。而對黨內初選機制的強調，往往將少數較極端的份子順利帶入政治程序——那些出現在黨內初選投票的選民只佔選民總數很少的一部分，往往以極端份子居多——從而使得政黨對一般選民欠缺回應和關照^⑫。

這項研究告訴我們，有效的問責機制是強政黨的核心基礎，政黨的後進或普通議員應該去支持那些能夠給出勝選政綱的領導者，政黨領導者的權力則取決於他們能否挑選出那些既支持政黨政綱、又能在其選區勝出的候選人。該書指出，在歷史上，美國主要政黨相對而言都是強政黨，政黨主要領導者對各類候選人的揀選有着較大權力，但自1968年的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起，貌似「民主化」的新型制度設計導致從初選候選人到政黨的核心領導層，溫和派減少而激進派增加，反而在傷害民主制度的運轉^⑬。該書還認為強政黨機制能夠減少金錢對於政治的介入，因為候選人在強政黨機制下，不需要再去採取高度個體化的「燒金」選戰模式^⑭。

在兩位作者看來，要革新美國政治，可以採納的步驟是改革當前的黨內初選機制、逐步根除不公平的選區

邊界劃分方法，終極目標是使每個選區的選舉結果都更能代表美國一般中間選民的取向，從而使得兩黨都需要為爭取中間選民支持而努力^{④0}。

在後續的研究中，夏皮羅進一步指出：美國民主制度下的政黨偏於軟弱，此點顯著不同於其他許多議會民主制國家。美國政黨往往缺乏內在的凝聚力，即使在兩極分化的情況發展到目前水平之前，政黨的紀律性也往往趨於薄弱。儘管存在這些缺陷，但從歷史上看，美國的政黨政治仍一直是使國會有效運作的最重要機制^{④0}。雖然美國近年政治走向急劇極化，但是實際情況是兩黨一面極化，另一面都在向政治光譜較右的一側移動。其中一項系統性原因就是：年輕人和較窮的選民往往投票率較低，所以兩黨都更為注重那些年紀相對較大和較有錢的選民，因為他們不僅對政黨提供資金支持，而且積極投票；這樣一來，兩黨的目光並不集中於所謂的「中間選民」上，而是都落在那些相對較老和較有錢的選民群體身上^{④0}。所以，美國政治有一種整體右轉的傾向和趨勢。

蒙克 (Yascha Mounk) 在媒體上公開對兩位作者的研究進行了評述，提出了幾點批評：首先，現今美國政黨在初選機制中，政黨高層和領導者實際還是握有不少權力；其次，很多現存的問題，或許反而可以用「更民主」的方式來解決，比如說，如果政黨領袖對個體議員施加的影響力更小，反而可以促使不少議員不必跟着錯誤的政黨路線瞎跑；再次，這項研究過度傾向和依賴於制度主義的路徑，但是，文化—心理和社會—經濟等因素（比如大眾媒體、政治獻金、移民問題、互聯網等）的影響可能才是導致極化的最重要原因^{④0}。蒙克的批

評反映學界對於政黨和政治精英的極化問題及其解決方法，有着截然不同的觀點。

三 政治思想史的維度

在此，筆者想引入第三個維度，即從美國政治思想史的視角對極化現象進行觀察。休斯敦大學教授弗莫雷斯基 (Alin Fumurescu) 2019 年出版的《妥協概念與美國建國：人民兩個身體的追求》(*Compromise and the American Founding: The Quest for the People's Two Bodies*) 一書^{④0}，或許會對我們思考和觀察美國當今的政治極化問題提供一種別樣的視角和思路。

本書分析了十七世紀的英格蘭和法國有關「妥協」和「人民」概念的理解分歧，如何在美國建國期間再次交織在一起（儘管有時是以流血告終）。作者回顧美國建國的關鍵時刻，從最初的清教徒殖民地到十九世紀南北內戰展開，認為美國人在不知不覺中將有關「人民」的兩種理解結合在一起：一是早期現代觀念，即「人民」是由多數決模式所支配的個體集合；二是將「人民」視為有着內在階層區隔的、受追求共同利益的理性支配的「法人團體」的古典觀念。美國人於是能夠實施「人民兩個身體」的範式，而這二者之間的辯證法一旦被打破，就會對美國政治產生重大影響^{④0}。

關於美國早期政治思想史的書寫，「妥協」本就是個學術冷門題目，有限的既有學術討論也多集中於制憲會議有關政治制度設計的爭論，或和奴隸制存廢議題相關。因此，弗莫雷斯基的切入點可說是很有新意。根據他搜羅的政治思想史資料，美國政治思想史上的思潮向來隨着這兩種關於

「人民」的不同理解，激盪交疊而延續發展，並不見得要特別傾向於其中的哪一個，而完全忽視另外一個。作者指出，「人民兩個身體」這一分析範式的妙用在於，能同時處理精英主義和平民主主義這兩種思想層級、避免二者的陷阱，同時取二者之所長^⑤。而且實事求是地說，在政治思想史上，二元並立地理解「人民」，既將人民視為眾人的集結，又將人民視為法人團體性質的整體，其實也是其來有自，源遠流長。

在弗莫雷斯科看來，清教徒傳統上對契約協定(covenant)即有着雙重面向的理解，一方面側重於個體同意加入新的政治實體，另一方面側重於個體加入後將順服於這一新政治實體的指令，這兩個層面同時存在^⑥。美國建國時代的清教徒對於「人民」這個概念有着兩重不同的理解維度：在水平層面，人們對於美國新政府的建立皆有互為平等的同意權；在垂直層面，他們則傾向於建立一種類似於精英政治的體制，並將日常政府的運轉信託於此種精英政治模式。當新的人民實體(a corporate people)成立後，具體如何形塑政府結構以及政治事務之日常運轉，都將由政治精英負責操作。當精英政治的治理者認為多數決議定的某些事項可能失之偏頗，甚至妨害群體公益時，將不會輕易地做出妥協^⑦。清教徒先是在美國東北的新英格蘭地區樹立這種對新構人民實體的兩重理解維度，百餘年後傳揚至獨立戰爭後的美國，最終匯流入美國憲法和相關的整個憲政體制。

弗莫雷斯科直言當前美國劇烈的政治極化現象，是一種真實存在的危險和威脅，這種愈演愈烈的現象，或多或少和人們普遍缺乏妥協意願相關。在當代美國社會中，人們對於其個體

身份和群體身份的標籤認同皆深有不安定、不確信之感，於是導致了人們過度保護和防衛的姿態，進而使得彼此之間缺乏意願進行折衷和妥協^⑧。從學術意義上講，政治極化和美國傳統的有關「人民兩個身體」的折衷妥協式路徑，自然多有隔閡與衝撞。於是作者的潛台詞也就很清楚：若想超越和克服當今的美國政治極化現象，其中一個方法可能是回顧美國政治的起始點：「人民兩個身體」的妥協傳統。

其實弗莫雷斯科所指出的現象，或多或少也呼應了此前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一個深刻觀察：從學理邏輯上看，2008年金融危機後本來似乎會產生一種左翼的民粹主義路線，因為畢竟金融危機和華爾街金融財閥之間大有關聯，然而實際上後來真正崛興的是茶黨與右翼勢力，因為人們似乎更在意的是那些相對較小型的涉及「身份政治」議題的不平等，而非更宏大的階級之間彼此鬥爭的敘事。當時，大約有三分之一的美國選民持續支持特朗普，另有10%至15%的選民因減稅等經濟議題而願意忍受特朗普執政，這兩股加在一起佔45%左右的力量足以使特朗普看起來很強大，不那麼容易被擊敗。特朗普的鬥爭手法之一，就是通過一系列在族群等議題上具有高度爭議性的話語，使得大批左派人士「抓狂」，進而將左派的回應也推向極端，使立場較居中的左派人士失去力量，最終導致整個民主黨變得不如之前那樣團結一致，其整體競爭力也就相應下降^⑨。



Compromise and the American Founding

The Quest for the People's Two Bodies

Alin Fumurescu

弗莫雷斯科直言當前美國劇烈的政治極化現象，或多或少和人們普遍缺乏妥協意願相關。(資料圖片)

四 餘論

那麼，是否存在一種可能，將上述三部著作的基本結論代入同一個場域等量齊觀呢？筆者認為，雖然這三部著作的數據來源和處理方法並不完全相同，但並非不可能將它們的基本結論整合以視之。比如前兩本書都認為，美國一般中間選民的政治立場和訴求並未有特別顯著的極化。此外，三本書都提出了自身對政治極化問題的解套方案：如果弗里納對美國政治的診斷是對的，那麼美國廣大民眾現實生活中最無關緊要的事情，恐怕就是政治領袖和精英那種意識形態上曠日持久的鏖戰了；如果羅森布魯斯和夏皮羅的研究刻畫無誤，則更趨強化的政黨組織也許能為當前的政治極化現象解套；如果弗莫雷斯科的研究可稱另闢蹊徑，則美國需從社會和文化的整體層面追尋求索原初「人民兩個身體」的那種自洽性和內省反思能力。

與此同時，若要真正理解極化現象，我們也應多方面地予以看待，正如蓋洛普 (Gallup) 的調查研究所指出，政治極化和相反觀點之間的衝突對個人和社會可能也會有一些潛在的好處。黨派鬥爭的那種嚴分敵我的觀點，比起許多試圖考慮多重利弊的情況和議題的複雜路徑，更容易使人認知。更重要的是，那些懂得如何迎合乃至操縱黨派份子情緒的人可從中獲得實在的經濟利益，這些受益者包括新聞網、脫口秀主持人、圖書出版商、博客作者和播客 (Podcast) 製作人等。而且，當政客根據感知到的威脅，從情緒上激發他們的選民時，他們就會獲得支持，甚至最大化投票率。正如政治顧問常向其客戶提供的建議一樣，負面競選活動通常比正向的努力來得更為有效^⑥。另外，我們

也有必要看到在一系列公共政策問題上，共和、民主兩黨支持者仍有交疊共識，比如說，根據近年的調查研究顯示，78% 的美國普遍選民都支持引進高技術含量移民，85% 的美國選民支持槍械武器銷售時的嚴格買家背景審查等^⑦。

數十年前，政治學理論大師沃格林 (Eric Voegelin) 曾經說過：「考慮到美國社會的結構，我很懷疑會出現這樣的兩極化。真正發生的是一種無足輕重的、有些無知的知識運動，這種運動因疏忽大意而極化到脫離美國社會現實的地步。」^⑧儘管今日美國不同於沃格林寫作當日的美國，但他提出的問題歷久彌新：政治上的極化現象究竟是否完全忠實地反映着美國社會現實所處的場景，以及其面臨的問題，其實可以有許多不同的答案。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問題、美國總統大選、2021 年衝擊國會山事件、拜登 (Joe Biden) 正式上台執政和特朗普時代終結，這一系列重大事件亦皆與美國政治極化現象直接相關。現今的美國經濟不平等現象空前嚴重，導致共和黨富裕的大金主和一般選民之間的利益衝突也空前顯著，在這樣的格局下，就需要一套更為極端的論說和宣傳鼓動體系，來作為黏合劑和戰鬥武器。於是共和黨人就轉而訴諸一套極端民粹主義的論調，試圖分化美國一般選民，進而在其中塑造出所謂「我們」和「他者」之間的嚴重對立，並將同為合法選民與一國同胞的「他者」打成非美國的、反宗教的和試圖顛覆美國價值傳統的對象，藉此模糊焦點，從而將金權政治 (plutocracy) 導向的經濟綱領順利帶進共和黨的核心政綱。

正如不少學者所指的那樣，特朗普政府之成立的關鍵基石，在於共和

黨委託了一系列像特朗普這樣極端的代理人，為美國政治極化和人們彼此之間的憤怒、憎恨情感不斷添柴加火，從而使得共和黨精英得以繼續追求在財務上對自身有利的再分配方案。但由於新冠疫情爆發後，特朗普政府輕忽疫情防控，試圖通過將防疫問題政治化來推卸其責任，引發中間選民海量不滿情緒，最終導致了其在2020年大選中落敗。隨後他不斷通過各種途徑鼓動其支持者，試圖影響和改變選舉結果，最終釀成2021年1月震驚全球的衝擊國會山事件。在未來，以特朗普為核心的右翼民粹主義思潮仍有所謂「一陽來復」之可能，拜登時代的極化現象雖有局部和暫時的緩和迹象，卻未見任何本質性的改善。在未來拜登四年任期中，如何與那些高度意識形態化、卻在眾議院穩握一席之地的特朗普核心「鐵粉」打交道，將是一個棘手且繞不開的問題。

註釋

① 美國政治研究學者發現，自1981到2006年國會兩院的政治極化程度一直在不斷地攀升。參見George C. Edwards, Martin P. Wattenberg, and Robert L. Lineberry, *Government in America: People, Politics, and Policy* (New York: Pearson, 2009), 388-89。

② 參見Douglas Barclay, “Democrats and Republicans Far Apart on Issues Ahead of Thanksgiving” (26 November 2019), www.prri.org/spotlight/democrats-and-republicans-far-apart-on-issues-ahead-of-thanksgiving/。

③ “Political Polariz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www.facinghistory.org/sites/default/files/Explainer_Political_Polarization.pdf.

④ 〈「驢象兩黨」國會對峙 美眾議院通過彈劾調查程序〉(2019年11月2日)，新華網，www.xinhuanet.com/world/2019-11/02/c_1210337200.htm。

com/world/2019-11/02/c_1210337200.htm。

⑤ “2018 Midterm Elections”, www.nbcnews.com/politics/2018-election/midterms.

⑥ John Avlon, “Polarization Is Poisoning America. Here’s an Antidote” (1 November 2019), <https://edition.cnn.com/2019/10/30/opinions/fractured-states-of-america-polarization-is-killing-us-avlon/index.html>.

⑦ May Wong, “America Leads Other Countries in Deepening Polarization” (20 January 2020), <https://siepr.stanford.edu/news/america-leads-other-countries-deepening-polarization>.

⑧ Kevin B. Smith and Alan Greenblatt, *Governing States and Localities* (London: Sage, 2018), 159-60.

⑨ Richard Walker, “Political Polarization—A Dispatch from the Scholarly Front Lines”, *Issue in Government Studies*, Special Edition (December 2006): 9.

⑩ Jeremy D. Bailey, *The Idea of Presidential Representation: An Intellectu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Lawrence, KS: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19), 9-11.

⑪ Gregory Eady, Justin S. Vaughn, and Brandon Rottinghaus, “Comparing Trump to the Greatest—and the Most Polarizing—Presidents in US History” (20 March 2018), www.brookings.edu/blog/fixgov/2018/03/20/comparing-trump-to-the-greatest-and-the-most-polarizing-presidents-in-u-s-history.

⑫ Jacob S. Hacker and Paul Pierson, “Confronting Asymmetric Polarization”, in *Solutions to Political Polarization in America*, ed. Nathaniel Persil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59-60.

⑬ Nolan McCarty, *Polarization: What Everyone Needs to Know*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chap. 3.

- ⑭ Benjamin I. Page and Martin Gilens, *Democracy in America?: What Has Gone Wrong 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It*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7), 162-63.
- ⑮ Alan I. Abramowitz, *The Great Alignment: Race, Party Transformation, and the Rise of Donald Trump*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8), 10-18, 119-21.
- ⑯ Nolan McCarty, Keith T. Poole, and Howard Rosenthal, *Polarized America: The Dance of Ideology and Unequal Riches*, 2d ed. (Boston, MA: MIT Press, 2016), chap. 3-4.
- ⑰ Ezra Klein, "A New Theory for Why Republicans and Democrats See the World Differently" (18 December 2018), www.vox.com/policy-and-politics/2018/12/18/18139556/republicans-democrats-partisanship-ideology-philosophy-psychology-marc-hetherington.
- ⑱ Robert B. Talisse, *Overdoing Democra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99-102.
- ⑲ Elizabeth N. Simas et al., "How Empathic Concern Fuels Political Polariza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14, no. 1 (2020): 258-69.
- ⑳ James Q. Wilson, "How Divided Are We?", *Commentary*, February 2006, www.commentarymagazine.com/articles/james-wilson/how-divided-are-we.
- ㉑ 李海默：〈新冠疫情下的特朗普政權與奉承政治學〉（2020年4月4日），澎湃新聞網，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6823665。
- ㉒ Morris P. Fiorina, *Unstable Majorities: Polarization, Party Sorting, and Political Stalemate* (Stanford, C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2017). 關於本書的更詳細介紹，參見李海默：〈美國政治極化現象的另一種觀察〉（2018年4月6日），觀察者網，www.guancha.cn/LiHaiMo/2018_04_06_452786.shtml。
- ㉓㉔㉕㉖㉗㉘㉙㉚ Morris P. Fiorina, *Unstable Majorities*, 219; 175-78; 162-64; 172-73; 59-66; 81; 59-66.
- ㉛ Nolan McCarty, "Anxieties about Congress" (6 November 2014), <http://thedemocracypapers.ssrc.org/anxieties-about-congress>.
- ㉜ Joe Schuman and Morris Fiorina, "The American Culture War Myth" (11 May 2019), <https://dividedwefall.com/2019/05/11/polarization-and-the-culture-war-myth>.
- ㉝ 筆者將“party sorting”一詞譯為「黨派分類」，蕭怡靖譯為「政黨歸類」，何曉躍譯為「黨派選擇」，李俊達譯為「分化」。參見蕭怡靖：〈從政黨情感溫度計解析台灣民眾的政治極化〉，《選舉研究》，第21卷第2期（2014年11月），頁6；何曉躍：〈美國政治極化的層次界定與生成邏輯〉，《國際展望》，2014年第1期，頁114；李俊達：〈Dwayne Woods教授主講「美國中期大選與美國國內政治走向」〉（2018年12月11日），復旦大學陳樹渠比較政治發展中心研究網，www.ccpds.fudan.edu.cn/74/6f/c4581a160879/page.htm。
- ㉞ Yochai Benkler, Robert Faris, and Hal Roberts, *Network Propaganda: Manipulation, Disinformation, and Radicalization in American Politic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chap. 10.
- ㉟ Jeff Stein, "Most Experts Think America Is More Polarized than Ever. This Stanford Professor Disagrees." (1 November 2016), www.vox.com/policy-and-politics/2016/11/1/13351284/america-polarization.
- ㉟ Manabu Saeki, "Anatomy of Party Sorting: Partisan Polarization of Voters and Party Switching", *Politics and Policy* 47, no. 4 (2019): 699-747.
- ㉟ Delia Baldassarri and Peter Bearman, "Dynamics of Political Polariz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2, no. 5 (2007): 786-88.

⑦ B. Dan Wood with Soren Jordan, *Party Polarization in America: The War over Two Social Contract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262.

⑧ Frances M. Rosenbluth and Ian Shapiro, *Responsible Parties: Saving Democracy from Itself*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8). 關於本書的更詳細介紹，參見李海默：〈美國政治走向極化是因為主要政黨不夠強勢嗎？〉(2019年1月10日)，澎湃新聞網，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813085。

⑨⑩⑪⑫⑬⑭⑮ Frances M. Rosenbluth and Ian Shapiro, *Responsible Parties*, 96, 100-102; 21; 5-6; 6-11; 104-109; 5-6.

⑯ Thomas Patterson, *We the People: A Concise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 Hill, 2009), 273; Frank J. Sorauf and Paul A. Beck, *Party Politics in America* (Glenview, IL: Scott, Foresman and Company, 1988), 152-53.

⑰ David Froomkin and Ian Shapiro, "The New Authoritarianism in Public Choice" (9 August 2019), <https://shapiro.macmillan.yale.edu/sites/default/files/files/NAPC%2008-09-2019.pdf>.

⑱ Ian Shapiro, "The Idea of a Political Party" (25 February 2020), <https://shapiro.macmillan.yale.edu/sites/default/files/files/The%20idea%20of%20a%20political%20party%202-25-2020.pdf>.

⑲ Yascha Mounk, "Is More Democracy Always Better Democracy?", *The New Yorker*, 5 November 2018, 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18/11/12/is-more-democracy-always-better-democracy.

⑳ Alin Fumurescu, *Compromise and the American Founding: The Quest for the People's Two Bod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關於本書的更詳細介紹，參見李海默：〈政治極化的美國，正在拋棄基於「人民兩個身體」的妥

協傳統〉(2020年5月25日)，澎湃新聞網，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7449099。

㉑㉒㉓㉔ Alin Fumurescu, *Compromise and the American Founding*, 1-26; 243; 122, 127-28; 146-49; 230-33.

㉕ 參見 Tim Adams, "Francis Fukuyama: 'Trump Instinctively Picks Racial Themes to Drive People on the Left Crazy'", *The Guardian*, 16 September 2018, www.theguardian.com/books/2018/sep/16/francis-fukuyama-interview-trump-picks-racial-themes-to-drive-people-on-the-left-crazy；李海默：〈特朗普時代，民粹主義有多少副面孔〉(2019年2月25日)，澎湃新聞網，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013085。

㉖ Frank Newport, "The Impact of Increased Political Polarization" (5 December 2019), <https://news.gallup.com/opinion/polling-matters/268982/impact-increased-political-polarization.aspx>.

㉗ 參見 Phillip Connor and Neil G. Ruiz, "Majority of U.S. Public Supports High-Skilled Immigration" (22 January 2019), www.pewresearch.org/global/2019/01/22/majority-of-u-s-public-supports-high-skilled-immigration/；"Continued Bipartisan Support for Expanded Background Checks on Gun Sales" (13 August 2015), www.pewresearch.org/politics/2015/08/13/continued-bipartisan-support-for-expanded-background-checks-on-gun-sales/。

㉘ 參見沃格林(Eric Voegelin)口述，桑多茲(Ellis Sandoz)訪談，徐志躍譯：《自傳性反思》(北京：華夏出版社，2009)，頁117；李海默：〈沃格林的意識形態與知性誠實〉(2018年6月25日)，知乎網，<https://zhuanlan.zhihu.com/p/38481713>。